

GONGZHENG SHIYUZHONG DE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公正视域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若干问题研究

董建萍 著

学林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KS019)

公正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若干问题研究

董建萍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正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若干问题研究/董建萍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486 - 0047 - 3

I. ①公... II. ①董... III. ①公正—研究—中国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5624 号

公正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若干问题研究



作 者——董建萍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3.5

字 数——33万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047 - 3/D · 3

定 价——34.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社会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理解和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号召人民、团结人民的核心理念。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建立 60 年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和追求社会主义公平正义道路上历经奋斗,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也走过弯路,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当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正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和复杂性日渐凸显,亟需进行理论整理和实践指导。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公正思想缺乏系统发掘,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较少作社会公正视角的论述。这种状况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误区直接关联,也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中,进行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有其相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正是秉持上述理念,希望能够为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体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发展路径,明晰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大致形态(模式),奉献一点微力。

本书共有十二个专题(相当于十二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题,主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中勾勒出“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任务”的认识过程。第二部分为第二、三、四、五题,梳理、归纳了马克思恩格



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社会公正思想,分析了新世纪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问题认识的新特点,尤其是党的十七大相关的理论贡献。该部分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理论建构、制度框架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即第六、七、八、九题,分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研究分析了社会公正建设的相关问题。这部分内容试图给出的意蕴,是认为社会公正也是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各个领域中都有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的基础性、制度性问题。第四部分即第十、十一、十二题,选取了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的若干社会问题——公民社会建设问题、“三农”问题、反贫困问题等作了专题探讨,试图在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从社会公正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研究并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推进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首次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纳入社会指标——和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命题的又一重要成果。十七大报告对“发展”的内涵和功能作出了这样的强调:增加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说明党在发展问题上已明确意识到效率和公平双轮驱动的必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是实现社会公正。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公正指标正成为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参数,社会公正事业已进入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我们认为,研究和提炼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正思想,是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展开的。在他们看来,所有包含在以往哲学家、政治家思想中的正义观



念,无一不是社会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反映,无一不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他们认为,社会公正的根本状况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平等观念在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内容,它的形成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存在永恒的平等;消灭阶级是社会公正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他们还指出: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必然是一种从形式到实质的渐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历史阶段。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中国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他们的社会公正思想具有极大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概言之,他们都信仰并坚定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价值;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平等、干群平等、按劳分配等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他们的基本思想也是一致的(当然这里应排除毛泽东晚年对于按劳分配的消极观点)。从历史角度讲,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都对新中国社会公正的历史性进步产生过全局性的影响。但同时,毛泽东邓小平公正思想差异性也是明显的。其中比较主要的,有对社会公平战略地位的不同理解。在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间,毛泽东更为看重公平的地位,甚至不惜牺牲发展效率以追求社会“公平”。而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坚定地将经济发展摆在“第一要务”的地位,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第一要义”,因此在新时期出现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要调整。在推进社会公正的途径和手段方面,毛泽东的主要着眼点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提升生产关系来实现公平,邓小平则力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在当下尤其富有启示的是,邓小平对于社会公平的理解,还体现在对个人权益的尊重。毛泽东“重整体而轻个体”的特点比较突出。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人基本上是作为集体的“附属物”存在的。邓小平虽然并没有否定个人利益相对于集体利益的第二性,但同时强调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和创造精神,他对于个人



权利的重视超越了毛泽东。总之,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现今强调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以人为本”推进社会公正有重要的联系。

我们认为,公正作为一种人们共处的观念和准则,应当承认它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超越时代的共同倾向和不断完善的思想内容,它的某些核心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现实的公正只能是一种合乎现实生产力条件的可能的公正。具体而言,每个时代的公正观念实际上主要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就今天的中国而言,社会公正必须体现人类已经进步了的观念,同时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而像特权等级思想、自由至上、平均主义这类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必然被否定。社会公正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效率为基本权衡点。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效率之间,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是基本权利和更多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所构成的话,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在基本权利中,应当包括社会可能提供的基本福利。也就是说,我们的权利观念包括权利和福利,所谓人权,就是由基本的资格及其保障条件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必须以福利为依托,人权必须以物权为条件,自由权必须与生存权、发展权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因此,社会公正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基本权益的人人平等。此权益即为权利和基本福利统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维护人民的权利平等,同时根据生产力水平为人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给所有的人相同的自由以及尊重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合理差异。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具有优先性。社会公正的题中应有之意,应包括保护公民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和平等,保障公民通过合法市场竞争获得的财产的自由和平等,依据“按劳分配”和要素“按贡献参与



分配”所致的收入差距应视为合理的收入差距。社会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以人为本并为了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必要但适当的利益均衡。政府以及所有的组织和公民,都有责任避免任何人,特别是弱者,由于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原因导致生活不保,沦为社会边缘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应特别倡导公民和各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尤其是“先富帮后富”。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同时否定任由市场机制和人的自然本性驱动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

我们认为,建国以来,以1978年为界,可将社会公正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即1949年至1978年之前。在这个阶段,大致又可分为新民主主义政策框架内的社会公正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的社会公正。这个阶段所实现的全体人民的公民权利平等,劳动权、受教育权、生命(卫生健康)权等的平等,“耕者有其田”的实现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它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重要制度基础。第二阶段,大致为1978年后迄今。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公正出现了重大转型,人民生存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平等的内涵大大扩展,社会分配和社会合作都提升到更具现代意义的新的层面。当然,现实发展阶段的社会公正都难以避免历史局限,社会公正的不断进步正是不断克服社会弊病的过程。2006年,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针对社会公正的制度完善提出了原则设想,要求加强以下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基本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六大制度支柱。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四大领域都是社会公正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建设与社会公正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建设首先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为社会公正的不断推进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建



设本身也包括诸多直接牵涉社会公正的内容,例如建立规范平等的雇佣关系、实现公平合理的(一次)分配等。因此,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对于社会公正具有基础意义。政治建设更与社会公正紧密相关,政治失衡是其他所有失衡的重要根源。而任何一个希图获得自己所期待之公平的阶层或社群,都需要直接、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调整法律,来实现公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有必要把公正作为其中的重要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之一,在当前尤其要着力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法治下的正义。文化建设与社会公正建设也是息息相关,任何时代的公正观念都是该时代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公正建设需要文化建设为它提供思想、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公正思想资源,我们应该努力加以发掘弘扬,古为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为当代中国正确的社会公正观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引导,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公正文化的发展方向。公民意识教育是形成现代公正所必须的人文环境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当强化公民教育,努力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文化。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公正发展的重点领域。目前党的十七大所部署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我们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不公问题的“主战场”,同时也是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社会建设直接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导向,致力于提升社会公平的实际水平,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迅速。尽管其仍属嫩稚,但在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重因子正在不断加大。在实现社会公正过程中,中国公民社会无疑也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它或者对政府的社会政策施加影响,或者通过一定的行为(规范)对利益分配起到调节作用,或者通过舆论及实际行动倡导



一种理念或意识。根据一般规律,公民社会可以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重要主体,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助手。我们应当重视公民社会培育,为公民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释放政策空间。

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与当今中国社会公正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度。“三农”问题的解决或者“三农”问题解决的程度,关乎着中国社会公平的程度。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三农”问题的生发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绵延至今不能不说是相关政策和体制长期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各级政府 and 全社会都要从历史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加快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落实农民的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

我们认为,由于历史、现实等因素的交互影响,贫困问题依然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的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目前中国贫困问题的特点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经济贫困与权利贫困并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为人们致富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由于相关制度构建的缺失和不完善,使这些机会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公平分配,由此造成公民之间所享有的实际权利差距悬殊,形成权利贫困与经济贫困的特定循环。与传统观念中将贫困更多地视为经济欠发达的产物不同,现代社会更多地将贫困视为社会欠公平的结果,并将反贫困视为一个财富合理再分配的过程。在当下中国,“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调整越来越成为我们反贫困的当务之急。政府作为反贫困主体功能发挥的大小,无疑决定着一个国



家反贫困成就的大小。但与此同时,社会也是反贫困的必要助力。当今中国通过社会力量来扶助反贫困事业,应该说不仅必要,且也已经具备相应可能性。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人们总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愿意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也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题：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思想中探索前行	2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重大任务	14
三、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公正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机遇	29
第二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正思想	40
一、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制约着社会公正的发展	41
二、社会公正是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	48
三、社会公正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循序渐进过程	54
第三题：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	62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62
二、邓小平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77
三、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评析与比较	87
第四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体系	94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95
二、借鉴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公正思想资源	101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体系	120



第五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制度框架	132
一、建国后至1978年中国的社会公正制度模式	132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公正体制的深刻变革	151
三、加快中国社会公正的制度建设	159
第六题:经济建设与社会公正	172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推进社会公正	172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效率、公平及社会分配的关系	182
三、平衡劳资权利和利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193
第七题:政治建设与社会公正	203
一、民主:一种最有助于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	20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权利保障	212
三、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正途	221
四、执政党和政府是推进社会公正的责任主体	234
第八题:文化建设与社会公正	239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公平思想资源	239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与公正观念建构	253
三、公民意识教育与社会公正的人文素质养育	260
第九题:社会建设与社会公正	27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	274
二、中国社会建设的政策演变:历程、现实与方向	283
三、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	300
第十题:公民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	310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311



二、公民社会在推进社会公正中的地位和作用·····	322
三、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331
第十一题: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 ·····	344
一、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概况和症结·····	345
二、社会公正与“三农”问题·····	359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及其实践·····	368
第十二题:当代中国的反贫困问题 ·····	377
一、当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概况及其根源探讨·····	377
二、贫困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压力·····	390
三、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新思路及其实践·····	397
部分参考文献 ·····	411

第一题：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历史车轮驶过了2008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根据当初“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已经完成了前两步的任务，正在为实现第三步，亦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为了更扎实地完成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将新世纪前20年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提出了要把目前还不全面、不平衡、发展水平不高的“初步小康”提升到更全面、更协调、发展水平更高的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其中，“社会更加和谐”成为具体目标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推进社会公正的现实性迫切性日益增强。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社会公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式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平正义的目标权重和政策考量。

应该说，在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我们不断在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在解放思想中探索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优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局 and 战略方针。社会公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热议话题、政府的政策重点，成为继续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价值目标，对中国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思想中探索前行

(一)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主义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通常用“新的历史时期”或“新时期”来指称此后迄今的特定时期。在全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中,“新时期”有着特定的实践基础、理论脉络和政治意蕴,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著名学者石仲泉认为,如果使用历史学的概念,我们还可以用“当代史”概念来概括这一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涵,以区别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现代史”^①。

实际上,把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定在1949年,但在现代史中要不要进一步区分当代史,学界并没有统一认识。石仲泉显然认为做这样的区分很有必要。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我们赞同石仲泉老师的这个意见。作这样的划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阶段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思想理论内涵。比如区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开创的,而开创者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既然是开创,当然具有相对的原创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及其所取得的认识成果、经验教训,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而不是这个理论本

^①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人民网,2008年1月10日。



身的内容。用“当代社会主义”来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只能是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起点只能是邓小平理论。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30年,十七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总结——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①言简意赅地点明了贯穿整个新时期的根本特征。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新时期的所有进步,几乎都是由各方面的改革所推动,并且在日益开放的大环境中实现。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本身又日益开明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过程中肯定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这个基本方向符合人民期望,顺应时代潮流,成就有目共睹,进步举世赞赏。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1978年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是3624亿元人民币,而这个数字在2008年是300670亿人民币,平均增长率在9%到10%之间。与同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比较,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7美元,印度是57美元;现在中国人均超过3000美元左右,印度是600美元左右。中国的先发地区如浙江,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6000美元。因此,快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30年来,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每次党代表大会都有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和任务部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核心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是贯穿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